

· 海外中医 ·

美国传教士中医观变迁探蠡（1840—1949）

赵洪娟，刘芳婷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 266061）

摘 要：明末清初以来，中医在西方传教士、医师等的介绍下逐渐被西方世界所关注，从中医诊疗方法到中草药性状、功效以及中医典籍的翻译与传播，传教士与海外汉学家以西方的思维模式研究中国医学，使得东西方医学有了比较的可能。到了近代，美国传教士成为继欧洲传教士之后在华传教士的主流，其态度在与中医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怀疑之否定转变为同情与认可，而中医也在此态度转变之中，完成了自东徂西的历程。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中医药；中医西传

DOI：10.16307/j.1673-6281.2023.01.011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23)01-0096-09

A Study on the Transition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View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840—1949)

ZHAO Hongjuan, LIU Fa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 Abstract 】 Since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und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doctors. Ranging from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TCM to the properties and efficac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classics,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ists overseas studied on TCM with a western mindset, making it possible to compare western and oriental medicines. In modern times, American missionaries have replaced their European peers to be the main force in China, and during their contact with TCM,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latter had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initial skepticism and denial to later sympathy and recognition; meanwhile, TCM had also completed a journey of dissemination from east to west.

【 Keywords 】 American Missiona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ward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基金项目〕山东省青创引育人才计划项目（201902）

〔第一作者〕赵洪娟（ORCID：0000-0001-5678-296X），教授，E-mail：zhjnn666@163.com

〔通信作者〕同上

近代西方通过殖民侵略迅速崛起,以西方文明为依托的科学技术随之输入中国,抢占中国传统科技的席位。彼时,国人对传统文化信心锐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自然也处于论争的风口浪尖,废除中医的呼声不绝于耳。追根溯源,最早对中医展开评价的是来华传教士,他们对中医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外各界对中医的看法。来华传教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这一群体一直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华工作、生活的经验,是探讨中西文化碰撞,展现不同价值体系以及信仰下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必涉之地。国内学者多聚焦于传教士在西医东渐过程中的贡献,而针对“中医西传”这一过程的研究较少。本文重点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医认知的变化及原因,希望能够窥探以往学界仅仅关注“西学东渐”的研究范式,而将目光更多的转向中西医学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影响,以便进一步认识中医的价值。

一、近代之前传教士对中医药之探索

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赴华传教者络绎不绝,他们将西方科学技术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向世界传递了东方的信息。此时在华耶稣会士成为中医西传的主要力量,其有的在著作中介绍了中医的基本情况和自身对中医的见解,有的对中医的治疗手段和中医药问题展开考察,有的将传统中医药典籍翻译出版,这些都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也为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欧洲耶稣会士关于中医的著述观点大致可分如下。

首先,传教士著述对中医的总体介绍及诊疗观点阐释。1583 年,赴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介绍了中医脉学、中药以及中医教育制度等,虽然内容较为浅显,但也不失为西方管窥中医文化的一个窗口。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所著《大中华志》一书中也介绍了部分中国医学知识,并且将中西医学进行对比,指出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众多,中医更有学术权威^[1]。除了来华传教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师对中医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们的资料成为西方接触中医知识的可靠渠道。中医的诊断方法一直是传教士关注的重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教士赫尔曼·布绍夫(Hermann Buschoff, 1620—1674)苦于痛风多年,在偶然的机下接触了艾灸,在其所著《足痛风》(1674)一文中,首次介绍了使用“艾草”进行治疗的灸法。168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医威廉·滕莱因(Willem ten Rhijne, 1647—1700)出版的《论关节炎》以及 1712 年德国医生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ämpfer, 1651—1716)出版的《海外见闻录》都详细介绍了针灸这一中医疗法,肯定了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1676 年,德国人吉尔弗西斯(Geilfusius R.W)出版了针灸学专著《灸术》一书。1683 年,德国人哥荷马(Gehema Janusz Abraham von, 1647—1715)在其著作《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一书中,对艾灸大加赞扬,认为艾灸是治疗痛风的妙手回春之术。此外,在《医学的钥匙》一书中,卜弥格绘制了针灸穴位的图解,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参考。除了针灸术,耶稣会士也注意到中国的种痘术颇有疗效,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于 1699 年 7 月来到中国,是介绍种痘术至欧洲的第一人。殷弘绪发现中医的种痘术对于预防天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在信中详细描述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他还介绍了中医的脉诊、中药以及《本草纲目》一书。王银泉指出,卜弥格在其著述中介绍了阴阳五行学说、《黄帝内经》、中医药以及中医的望诊、舌诊以及脉诊等,是中医文化研究之集大成者^[2]。卜弥格在其《论脉》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脉学知识和切脉的方法,在《医学的钥匙》中描述了经脉循环的原理及其运转不良的危害。此外,他依据王叔和的《脉经》写成《中医脉诀》一书,书中记录了 15 种脉象及其应对医治方案。在《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一文中,卜弥格介绍了生病时舌头会出现的症状,并附有图解,为西方人了解望诊这一中医诊断方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于中医诊断以及治疗方法的介绍,丰富了西方的诊疗手段,为疾病的治愈提供新的可能,时至今日仍

有许多海外人士采用针灸等中医治疗方法缓解病痛。但此时围绕着中医的评价并不总是正面的, 1760 年,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 (Pierre Martial Cibot, 1727—1780) 远赴中国, 他是继殷弘绪之后第二位向西方翻译并介绍种痘术的传教士, 但其觉得中国的接种方法收效甚微, 且中医缺乏解剖学基础, 中药药效也存疑, 因而认为整个中医体系是荒谬可笑的^[3]。总体上看, 16—18 世纪传教士对于中医的介绍并不完善, 也未成系统, 仅仅是中西信息交流的小部分。同时, 在华的传教生活使得传教士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中西医学的异同, 对中医的描述也比较准确, 总体持肯定的态度, 这些介绍和见解也为后续西方对中医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其次, 传教士对中草药等内容的考察研究。对中医的系统介绍与研究应始于 17 世纪, 以波兰传教士卜弥格 (Michal Boym, 1612—1659) 入华为标志, 中医西传的大门就此打开。自卜弥格于 1644 年抵达澳门到 1659 年逝世, 凡 15 年, 著述不可胜数, 堪称传教士汉学家之典范, 其中有关中医研究的著作就有 7 册, 其余论著、文章也对中医知识多有提及。他的《中国植物志》围绕着中医的药用动植物展开讨论, 书中描述了 30 余种动植物, 并就其性状、功能进行描述, 开拓了西人研究中国自然状况的先河, 为之后的来华传教士及博物学家们指引了新的方向。此外, 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意大利传教士匡卫固 (Martino Martini, 1664—1661) 以及法国传教士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 等皆在其著述中对人参这一中药材有所提及。1687 年, 德国汉学家门采尔 (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 发表《论人参根》一文, 因此人参也成为欧洲人熟知的中药之一, 其商业价值也得以进一步被发掘。1711 年,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 (Petrus Jartoux, 1668—1720) 在写给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人参的产地、性状、功效等。海外传教士及医学工作者传回的讯息为身处欧洲的博物学家和汉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 世纪, 由传教士开展中医药研究引起的中西博物学交流达到高潮, 《本草纲目》进入在华西人的视野。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不仅调查研究了中国的草药植物, 还仔细研读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在寄回欧洲的书信里, 他细致描述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以及阿胶等中药, 此后更是将制作阿胶的原料寄回, 以便欧洲的医生及博物学家对其进行研究。18 世纪前半叶, 法国传教士范德蒙德 (Jacques Francois Vandermonde, ?—1746) 将根据《本草纲目》收集的 80 余种矿物类药材带回巴黎, 并编写《〈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一书以对带回的药材进行说明。1735 年, 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 第三卷中节译了《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医药汇录》等传统中医药典籍的部分内容。此时期的在华传教士及医学工作者也热衷于采集中国本土动植物标本及种子等寄往欧洲, 如法国传教士汤执中 (Pierred'Incarville, 1706—1757)、李明、韩国英等。

明末清初之间海外传教士对中国自然物种展开田野调查, 为后期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传教士的西方背景结合中草药典籍和实地考察, 产生了许多珍贵的学术著作, 这些著作不仅为西方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同时也对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再次, 16—18 世纪中医典籍翻译在西方的出版和传播。明末清初, 中西医学相遇之际, 虽有不少在华西人对中医展开调查研究, 为之著书立说, 但深入了解中医者甚少, 出版的刊物多以介绍为主, 对中医典籍的翻译更是寥寥。西译中医典籍最早的著作应是法国人杜赫德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 该书第三卷为《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医药汇录》等著作的节译本, 《本草纲目》的第一个节译本便出自此书。此书包含中医脉理、药物、医方、卫生等方面的内容, 书中还介绍了李时珍的本草分类法, 认为这种分类方法与以往“博物致知”的中国传统思想有所差别。书中有关中医典籍的译介和分析对于西方了解中医具有重要意义, 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和追捧, 一再重版和翻译。卜弥格是传教士中研究中医的佼佼者, 部分学者认为其著作《中国植物志》可能是《本草纲目》的选译本。1732 年, 在华的范德蒙德返回法国, 同时他也带回了摘译的《本草纲目》金石部手稿和书中描述的一些矿物标本, 后来由巴黎科学院院士儒瑟转交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保存, 直至 1896 年得以刊行。据上所述, 16—18 世纪虽然已经有中医典籍翻译并出版, 但大多是节译或摘译,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译介, 传教士中有能力对中医中药进行翻译研究的人

也寥若晨星，不过相较于前期浅显的介绍，后期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随着 1775 年耶稣会宣布停止在华活动，远赴中国的耶稣会士人数骤减，但中西医学交流的步伐并未就此而停止。总体来看，16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医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质疑和贬抑的声音偶有闻之，此时期的赴华传教者更多致力于探究中医之长，并将其传播到欧洲。正如范延妮所说，此时期的中医对于西方人而言是新颖而陌生的，误解与批评不可避免，但总体而言是积极正面的，不同态度之间的争论也为之后中医西传奠定了基础^[4]。而 19 世纪时，以美国传教士为主的在华西人却站在了传统中医的对立面，认为中医就是“迷信”“愚昧”的代名词。

二、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对中医之否定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传教士入华，此时西方传教士中已经掀起批评中医的浪潮，且不同于此前部分耶稣会士对中医开展的长时间细致调查，此时期的在华传教士已无耐心对中医进行细致研究，在此背景下赴华的美国传教士更是对中医大加贬斥，此种论调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

18 世纪中下叶，病理解剖学的建立使得欧洲人对于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进至器官，欧洲正处于古典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型期，不同于耶稣会士对于中医的赞美与传播，此时已有不少赴华西人对中医持怀疑态度。西方世界对于中医的评价已经急转直下，认为中医是这个东方大国处在“半文明”阴影下的罪魁祸首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医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西医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系统的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临床医学建立，外科专业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欧美传教士，尤其是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自然会将西医与中医相比较。在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接触和了解之后，中医褪去了最初的神秘面纱，沦为西方医学的反面参照物。

1807 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达中国，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领土的新教牧师。来华不久，马礼逊就主编了一本英文刊物《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这本杂志也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东方的窗口。受到当时爱丁堡大学以及英国 Hackney 园艺公司的委托，马礼逊对中国的社会以及中医药情况展开调查。为此，马礼逊购置中医药书籍并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一同探究中医药学，同时还委托李文斯顿调查广东地区的疾病分布和分类现状。根据李文斯顿的分析，中国穷人的疾病主要分为两类：洁净类，包括盲、跛、聋哑三项；不洁净类，麻风病等，在诸多疾病中，眼病最为常见。之后来华的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1796—1879）以及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皆选择眼科为治疗重点，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李文斯顿的影响。

1830 年，响应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呼吁，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远赴中国，成为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1832 年，他同几名在华传教士一道创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本英文期刊，其在 1840 年的社论中指出，中国的医书中存在诸多讹误，正确的部分寥寥无几，使得西方人不确定在此基础之上的中医是否有效，也不确定中医医师又是如何据此进行医学实践的^[5]。1833 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也指出，中医没有解剖学，对于人体生理构造一窍不通，中药虽然种类繁多但药效有待考察，而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更近乎一种迷信^[6]。这些刊物和著作在西方影响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医的总体性认知。

1834 年，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医师伯驾到达广州，他在耶鲁大学受过神学和医学训练，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1835 年，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于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并于 1839 年拓展成一家综合性医院。1838 年 2 月，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郭雷枢的倡导下，医学传道会成立，郭雷枢任会长，裨治文与伯驾任副会长，同年 4 月，由郭雷枢、伯驾和裨治文联名签署的一份宣言表明，要用西

方医学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以便搜集情报、建立贸易关系,为在华西方人赢得更高地位,他们的医学活动也成为列强利用医药侵略中国的先声。1835 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商榷书》一文引起西方教会的巨大反响,一大批传教医师接踵而来。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记载,仅 1835—1860 年间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中就有 18 人拥有医学背景,17 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7],这其中就有著名的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嘉约翰是美国长老会派遣的医学传教士,于 1854 年抵达中国香港,1859 年其创办了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其也是传教士医生学术组织“博医会”的首任主席和《博医会报》的首任主编。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医师代表,嘉约翰几乎全方位地否定了中医的合理性。在 1877 年 5 月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嘉约翰宣读有关医学差会的论文,指出中国在医疗方面的问题,认为中国医学充满迷信、不懂解剖、不明生理、对于药性和疾病的本质也毫无所知,外科也处在野蛮阶段,在中国医疗场所既没有专门的科室(如儿科与产科)和慈善机构,也没有卫生法规^[8]。嘉约翰对于中医的否定在美国传教士群体中得到了共鸣,在 1890 年第二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内地会的道思韦德(William Arthur Douthwaite, 1848—1899)做医药传教的报告中就表示中国的医学完全不具备科学性^[9]。美国传教士博恒理(Henry Dwight Porter, 1845—1916)的译著《省身指掌》一书,贾乃真为其作序,序中他提到博恒理与中医大夫探讨人体内部构造时,中医医师“所言皆出臆度”,中医著作“所言经络脏腑,诸多舛讹”^[10]。博恒理对中医的怀疑态度不仅促使其著书立说,以介绍骨骼结构、器官系统等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到中国,也影响了他周围一批华人对于中医的观点。以上几位都是美国医学传教士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观点通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以及报刊和著作等传递到在华西人以及海外学者的手中,他们对中医评价也说明在当时大部分传教士医生那里,中医全无地位,是与现代医学背道而驰的旧式医学手段。虽然否定中医已经是此时在华传教士的常态,但仍有个别传教士通过探索发现了中医的独特价值。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1855—1925)对山东济南的中药展开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指出许多中药具有极大的医用价值。此外,美国医生史密斯(Frederick Porter Smith, 1833—1888)在汉口行医期间常与中国医生一起应诊,对中药有较深了解,并于 1871 年出版了《中国药料品物汇释》一书(该书大部分取材自《尔雅》《广群芳谱》,部分译自《本草纲目》)。以上两位对中药的关注与肯定从侧面反映了中医并非像此时大部分传教士所宣称的那般一无是处。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为何总体上否定中医的价值呢?原因探讨如下。

首先,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清末国力衰微,封建君主统治摇摇欲坠,尤其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从西方眼中的文明古国沦为“半文明”的阴影之地。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迅速发展时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为了寻求市场、积累更多财富,地大物博的中国就成了列强的瓜分对象。同其他西方科技类似,医学作为一种侵略工具进入中国,在此背景下入华的美国传教士自然会带着偏见去看待中医文化,而中西相异的医疗手段也成为其攻击中国人之愚昧、迷信、无知的铁证。

其次,传教士的核心使命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所以不论是展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或是开展医疗活动,都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基督教发展的舆论环境。1864 年,卫三畏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除非基督教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在此之前,中国不可能在文明方面取得进步^[11]。此时的传教士习惯于将基督教与西方文明联系起来,认为西方的快速发展乃是上帝指引下的结果,他们将中国落后的状况同中国人不信仰上帝联系起来,认为东方各国处在“半文明”的阴影之下,亟须改造,所以他们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作为传教手段,西方医学自然也在其列。因此,否定中医的另一面是为了宣传西方医学的科学有效,以便以医传教,将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此外,传教士运动兴起于西方殖民开拓的时代,西方各国打着为被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地区带来“光明”的旗号,意图将当地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征服者心理催生下的傲慢使得来华西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正如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晚年写给年轻传教士的手册中所指出的,传教士不远千里传教这件事已经体现了西方世界的自我中心主义^[12]。

可以说在赴华之前这些传教士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预设,认为自己前往的是一片没有希望的荒芜之地,因此中国本土医学自然也是没有科学和理论支撑的半原始医学,无法与迅速发展的西方医学相提并论。

再者,中医地位被否定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西医之间的分歧。据前文讨论可知,明末清初之际传教士乃中医西传的主要群体称中医为“医学的钥匙”,这些都说明此时中西医学在西方人的眼中大体是地位相当的,且此时中西医学都处在自然医学阶段,总体而言差异不大,甚至中医的临床医学还要更胜一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指出中西医学各有其优势,没有优劣之分,西医应该学习和借鉴中医知识^[13]。但进入 17 世纪,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使得西方医学逐渐走向现代医学,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的科学基础差异较大,使得具有医学背景的传教士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而明清之时由于中医医者地位不高、中医发展缓慢等原因,中西医学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后,也碰到了由于中医师医术不精而饱受折磨的患者,加上语言文化的隔阂、本土意识对外来传教医师的排斥,这些都使得他们没有机会系统地、正确地了解中医。美国传教士贬低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怀疑与否定,文化优越感加持下产生的偏见使得传教士们难以正面认识中医及中国文化。在一些传教士眼中,东方诸民族正处于灭亡的阴影中,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抑或者中医都仅仅是他们传播西方文明,带来上帝“福音”的阻碍,因此,19 世纪美国传教士在面对中医时的否定态度也便一目了然。但进入 20 世纪初,教会内部和国内情势又发生了变化,传教士对待中医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

三、20 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对中医之认可

在华美国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转变始于 20 世纪初,此时中西方社会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促使教会内部调整传教策略,尊重其他地区的文化。留学归来的华人成为医疗行业主流,以医传教风光不再,而医学传教士们在华多年的经历和观察也促使他们将眼光转向中国本土医学,发掘中医的优势所在,因而美国传教士对待中医的态度也由否定转向认可。

20 世纪初,民国政府试图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本土医学,虽然中医界人士不断反抗,在政府的支持下最终还是形成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与此同时,教会医疗不再独占鳌头,留学归来的医学生日益增多,他们投身于医疗、政治,掌管了卫生行政大权,医学传教士的地位逐渐被中国人的西医业所超越。同时在教会内部,自由主义神学兴起,教内人士更愿意认识和接受基督教以外的观点和文化,在华传教士的角色也从文化上的“征服”转化为“服务”。医学传教士不再攻击中医以获取传教机会,转而探寻中医的合理之处,以更宽容的态度面对中西相异的医疗手段。不同于国内废除中医的言论,医学传教士们基于对中医疗效的观察,意识到中医在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同情”与认可的言论逐渐增多。

美国传教士著述中对中医的评述是探寻其中医观转变最有力的材料。美国医学传教士吉佛瑞(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1871—1945)与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于 1911 年出版《中国的疾病》一书,从理论基础、医疗实践以及中药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医学。书中指出西方人对于中医的看法多有偏颇之处,但是中医实践中错误之处却被百倍地放大,其二人认为中国存在着的这种经验型的看病行医,代表了许多代中医思想和经验的凝结,值得西医从业者的尊重和更大的视野中来思考^[14]。此外,马雅各于 1937 年出版了《中国实用麻风病手册》一书,为中医西传做出了切实贡献。其二人的观点也可以说明,19 世纪中下叶传教士对于中医的否定态度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偏见,他们忽略西方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双眼却紧紧盯着中国本土医学里的“非科学”“非理性”的部分,对其大加贬斥,忽略中医千年流传背后的实用性和有效性。1916 年,《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创刊 30 周年之际发表了社论《中国的医学与外科》,就 19 世纪以来传教士对中医评价进行了分析,认为过去医学传教士为了争取本国教会支持自己在中国行医,往往强调中国本土医学的落后,但如

果中医真的没有任何疗效,此种医疗办法也不会存续,中医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其合理性^[15]。《博医会报》是在华西医传播西医科学、发布临床医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媒体,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科学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华西医学者的整体态度。这种态度转变也引起美国学界对中医的注意,1915年,《医学在中国》(*Medicine in China*)作为介绍中国本土医学的期刊于纽约创办。从《中国丛报》里大肆批判中国本土医学的落后愚昧与迷信,到民国后《博医会报》中较为中肯的分析与思考,美国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任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胡美(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是中西医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1905年,胡美受雅礼会(Yale-China Association)邀请来到中国湖南长沙,毕业于医学名校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胡美带着为落后地区带来科学传播“福音”的信念,踏上中国的土地。起初中医并未进入他的视野,但是随着与中国同事以及中医医师的接触,胡美慢慢认识到中医的实用性,开始在行医中结合中医的方法,借鉴中国医疗经验。胡美对于中医态度的转变也使得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关注到中西医共通之处。他在给一个女孩治疗伤寒时,发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准确描述了寒冷、头疼、没有食欲、流鼻血等发烧时的症状,并且指出不要使用药性猛烈的催泻素。这让他十分惊叹,颠覆了中医全无学理这一传教士普遍认知,也促使胡美在实践中更为关注中医的疗效,此后他还发现,尽管中西医的诊断方式不同,却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发觉一些西医所使用的药物在很久以前就已为中医广泛使用,而那些西方人所不理解的动物制品类中药,有一些是有切实疗效的。他以帕克·梅森爵士(Si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为例^①,说其在厦门行医时,曾为一位恶性贫血的西方妇女治疗,但没有成功。后来一位有名的中国医师承诺治愈她,让她吃乌鸦的肝脏,结果她神奇地康复了,这让梅森非常吃惊,这比西方科学发现肝脏对恶性贫血具有特殊疗效早了20年。通过在中国的医学实践以及对中医近距离观察,胡美折服于中医的疗效,并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其自传《道一风同》中他写道:“尽管受到来自陆地和海上的攻击,尽管城市和海岸线被封锁和轰炸,但是中国继续不知疲倦地生存着,正如她每次面对敌人时一样。她的根基坚固,因为她的根深植于未曾开发的土地里。她的人民的内心被塑造得很有活力,强壮得足以对抗毁灭。而中国的医生们已经重新开始寻求更多的知识,基于对过去宝贵遗产的自信,对国家健康和社会福利新模式的关注,他们现在正热心铸就东西方精神的联系。”^[16]胡美不但欣赏中国人民的韧性,期盼着中西医学的交流,他还希望西方学者能够通过友好方式到达中国本土。胡美在华生活22年,出于对中国医学、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感怀与喜爱,归美后相继发表了《中国医道》(1940)、《道一风同》(1946)以及《传教士们的勇气》(1950)等著作。与胡美一样,许多在华工作生活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由怀疑转向“同情”甚至认可与欣赏,他们热切的探寻中医药这一巨大的医学宝库。他们怀揣着传教的信念之火种,希望改变这个他们所认为的保守、落后、到处是异教徒的蛮荒之地,却在传递自己信息的同时,被东方独有的医学知识所打动。

观念的转变促使许多传教士将目光转向中医典籍与中药的研究,在译介《本草纲目》方面,美国传教士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开创性的。1911年,司徒柯德(George Arthur Stuart, 1859—1911)编著《中国药物草本部》一书,将史密斯所著《中国药料品物汇释》重新进行编辑整理,原拟分为植物、动物、矿物三册,然而第一册编写完成后,司徒柯德就与世长辞。书中内容大致译自《本草纲目》中12卷至37卷的药品,书末附有366种尚未考订的药物,并有中文、英文、植物3种索引,使用非常方便,当时研究中药的人士“莫不推此书为最有价值之巨著也”^[17]。1920年,美国人贝里(Bailey, L. N)出版《中国植物集》一书,华生(Watson, Ernest)于1923年出版《中国主要商品(药材)》一书,这两本都是有关中药的著作。同时,对中医药的译介活动也引起美国政府对于中草药的关注,1920年起,美国4次派遣植物学家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 1884—1962)入华以收集中药植株,这些学术活动为中医药

① 帕克·梅森(1844—1922),苏格兰人,寄生物学家,在中国工作长达23年,是热带医学的先驱者。

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炼丹术亦为美国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之一，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所著《中华古道》（1910）一书中，专章讨论了中国的炼丹术，认为炼丹术在中国起源很早，后传阿拉伯，成为近代化学的最早根源。1928 年，美国传教士约翰生（Obed Simon Johnson, 1881—1970）作《中国炼丹术考》一书，主张欧洲的炼丹术乃传自中国。不久，美国的戴维斯（Tenney Lombard Davis, 1890—1949）在中国化学工作者帮助下，将许多中文炼丹文献译为英文，中国炼丹术在世界化学史上的地位更获肯定。20 世纪前叶，美国传教士对中医态度的转变加快了中医西传的步伐，不少传教士投身于中医理论、中医典籍、中医药的译介事业当中，为中外医学交流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到认可的转变原因为何？考证可知，由于许多华人远赴重洋，学习现代医学，回国后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医疗事业，教会医疗风光不再，医学传教士的地位逐渐被中国人的西医业超越。而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宗教以及西方文明产生怀疑，美国传教士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 1888—1970）指出，西方和基督教的声誉都因一战而受到影响，人们开始质疑所谓的上帝是否真的可以带来福音^[18]。与此同时，国内民族主义兴起，社会各界如火如荼地开展救亡图存的活动，这些都促使教会人士对传教事业进行反思，教内要求传教士要调整自身行为，尊重其他地区的文化。由此在华基督教人士掀起一股研究中国文化热潮，医疗传教士周以德（Walter Judd, 1898—1994）在 1925 年的一场报告中宣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实行基督教的准则，而过去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应当接受的教导其实早已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19]。这股热潮也影响了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而中医作为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重新获得在华西人的关注与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加速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发展，理性主义的风吹进万千人的心中，同时也促使世俗主义的盛行，这使得以神学为根基的基督教遭受重创，宗教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基督教的首要威胁由异教徒转变为西方内部流行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因此，医学传教的目的性减弱，在华从事医疗行业的传教士们无须紧紧围绕着“以医传教”这一目的，可以更多地作为医疗从业者对中医进行评介与研究，对待中医的态度有所缓和，观点也更为公正。此外，美国传教士对中医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美国传教士个人情感的转变以及在实践中对中医多年的观察。正如在华传教多年的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 1883—1979）1919 年撰文时所说：“传教士怀着火一样的热情到东方传播福音，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也把自己的信息告诉了他。传教士离开西方时想改变东方，但回来时自己却被改变了。”^[20]

由上可知，美国传教士中医观的转变始于 20 世纪初，由于中国人的西医业兴起，医学传教士地位不再，教会转变医学传教的方向，承认中医包含有益的成分，而美国传教士也在多年观察与生活的经历中，发现中医在诊疗过程中有其特有的功效。

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赴华者甚众，初时以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他们介绍中医信息，对中医药物进行研究，同时还将中医典籍进行翻译并传播到西方世界，这些都为美国传教士入华后开展中医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西方传教士对中医的评价大致经历了平视、轻视以及重新审视三个阶段^[21]。其对中医观念转变的同时，传教的主体也由最初的欧洲耶稣会士渐渐转变为美国传教士。相比较而言，美国传教士对于中医的态度转变仅有两个阶段，即由否定到认可，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传教士入华时间较晚，而古老的中医在现代医学的反衬下显得落后而愚昧，因此传教士入华便对中医充满偏见、大加贬斥，而后医疗格局的变化、教会内部的反思以及长时间的观察使得美国传教士得以理性而公正的评判中医，甚至被打动。此外，欧洲耶稣会士入华的兴盛时期，西方医学尚未成熟，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而 1840 年后，欧洲赴华传教者不再占据在华传教士的主流地位，而此时大量美国传教士来华，这其中更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与欧洲传教士相比，他们拥有更加深厚的医学知识背景，此时的西方医学也取得跨越式发展，因而探究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医医学，

更能适时地反映近代东西方医学碰撞的火花。

随着基督教医学退出中国,传教士对于中医的探索活动也随之终止,但是中西医学的交流和碰撞仍在继续。回顾中医对外传播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医并不是一个主动外输的体系。“几乎所有中医药的外传都是别国人将中国医生请去、掳去或别国人到华学习或做生意或遭遇战争等原因而由外国人带回去的,包括中医师、中医书籍、中医治疗工具和药物。”^[22]而以来华西人为主的“中医西传本质上是中医西化的过程”^[23]。美国传教士用现代医学概念理解中国传统医学,脱离原有背景对中医进行解读和翻译,不免扭曲中医真正的内涵。探寻历史面纱之下中医学的真正面貌,站在史学角度研究传教士中医观念变迁的根源,对于重新评价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增强中医自信心与诠释力,以及如何在传播中保留本土医学的精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曾德昭. 大中国志 [M]. 何高济,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68.
- [2] 王银泉. 十七世纪来华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中医译介研究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113-121.
- [3] 韩琦.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1582—1793)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16-117.
- [4] 范延妮. 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及影响研究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20-22.
- [5] Linda L L. *Needles, Herbs, Gods, and Ghosts: China, Healing, and the West to 1848*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8, 288, 296.
- [6] 卫三畏. 卫三畏文集·中国总论四卷 [M]. 陈俱,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62-671.
- [7] 伟烈亚力. 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名录 [M]. 赵康英,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 [8] Yates M T, Nelson R, Barrett E R, et 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M].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115-117.
- [9] Lewis W J, Barber W T, Hykes J R, et 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M].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270.
- [10] 博恒理. 省身指掌 (序) [M]. 北京: 灯市口美华书院, 1885: 3.
- [11] Frederick W W.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 352.
- [12] Smith A H. *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 [M] // *The Relations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18: 45.
- [13] 安文涛, 关殊, 张文珍. 莱布尼茨和中国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126.
- [14] Jefferys W H, Maxwell J L.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M]. Philadelphia: P. Blakiston's Son & Co, 1911: 13-14.
- [15] Editori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urgery [J]. *CMJ*, 1916, 30(6): 434-435.
- [16] 爱德华·胡美. 道一风同 [M]. 杜丽红, 译.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1: 207.
- [17] 王吉民. 本草纲目译本考证 [J]. 中华医学杂志, 1942(11): 381.
- [18] Eugene B. *My Life in China, 1910-1936* [M]. Michigan: Asian Studies Cen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0: 176.
- [19]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 (1830—1932) [J]. 历史研究, 2012(2): 68-82, 191.
- [20] 连曦. 传教士的皈依: 在华美国新教差会中的自由主义 (1907—1932) [M]. 宾夕法尼亚: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出版社, 1997: 106.
- [21] 陶飞亚.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J]. 历史研究, 2010(5): 60-78, 190.
- [22] 马伯英. 中外医学的跨文化传通 [J]. 科学, 2012, 64(6): 32-34.
- [23] 高晞. 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 [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6): 15-24.

(本文编辑 常馨月)